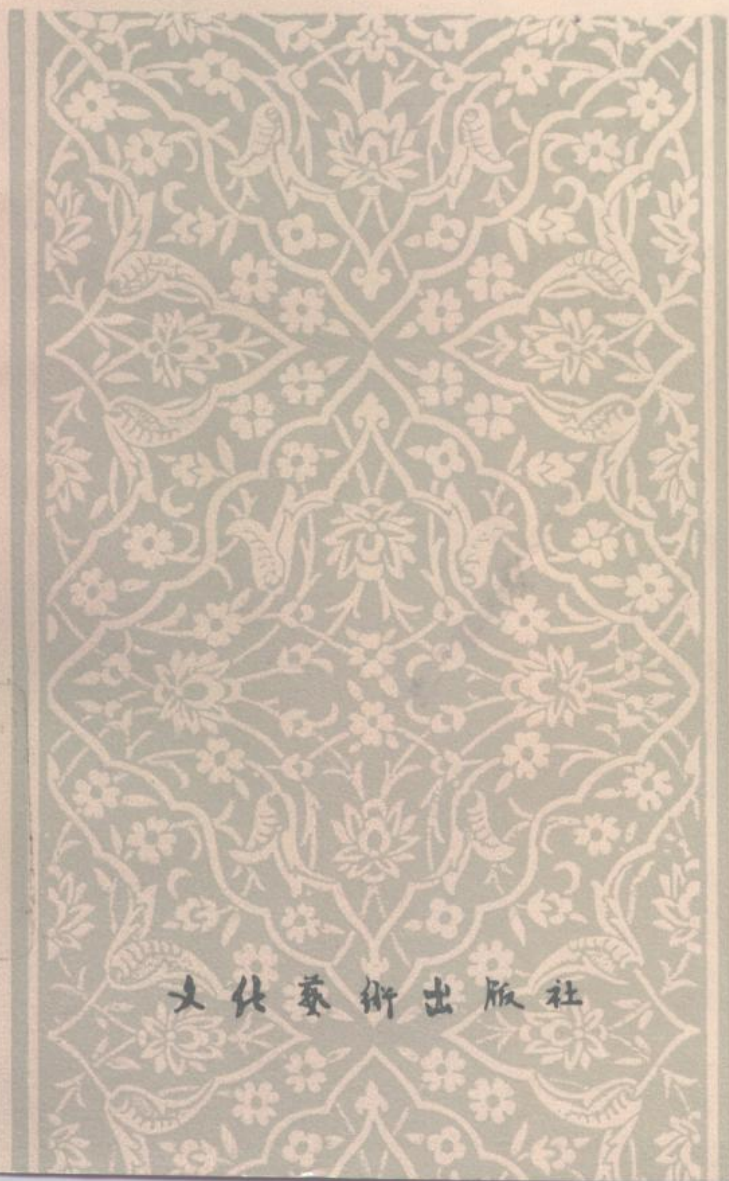


NIAN JUN SHI YAN JIU

张 珊 著

捻军史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捻军史研究

张 珊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026163
本书出版得到安徽大学
科研基金部分赞助

捻军史研究

张 珊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28,000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7-5039-1280-4/Z·47

定 价:7.90 元

重视农民问题研究(代序)

欧远方

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旧中国是如此、新中国也是如此。在旧中国,不管那朝那代,要得长治久安,必须解决好农民问题,否则,农民就要造反,社会就要大乱。新中国成立后,农民问题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问题解决得好,社会、经济就能顺利发展,否则,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建国初期如此,建国四十二年的今天仍然如此。理由很简单,因为农民仍占人口的大多数,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开宗明义就说了下面一段话:

“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这段话讲得很精彩,很实事求是,是经过实践检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沿着这个思路制定改革和法律而加以贯彻实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有希望。我国现在的发展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要归功于改革,而改革又是从农村开始。通过改革,农民不但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开始向小康前进。农村改革推动了城市以至全面改革,改革效果明显。好像下棋,投下了搞活农村这一颗关键性棋子,全盘皆活了。

由此可见,研究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始终是重

要课题。其侧重点,当然放在研究当代,但研究历史也不可忽视。

研究农民问题,不可不研究农民起义,农民的斗争。而研究农民起义和斗争,又不可能不涉及到农民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分析和解剖这些关系,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加深我们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大概就是以史为鉴的作用吧。毛泽东就是研究了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农民起义和中国农村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中国革命中农民特殊的重要性,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农村包围城市、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战略策略,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众所周知的范例。这个思想路线,为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所继承和发展,他提出重新认识中国国情(最根本的国情仍然是农民占大多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且从农村改革一开始,就热情地加以支持,——支持肥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从而使农村改革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中国大地,假如说改革就是革命,这是又一次农民革命,是又一次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即农村和率先改革推动和影响了城市改革和全面改革,所谓“包”字进城,不就是这个含义吗?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多,而且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安徽也是如此,而且具有安徽历史的特色。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陈胜吴广在今宿县大泽乡的起义,影响极大。是人所共知的。后来又有数不清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到了近代,发生了太平天国、捻军大规模的起义。安徽虽然不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但后期活动主要在安徽。而捻军起义则发源于安徽,并波及到河南、山东、湖北、江苏、陕西、山西、河北各省,前

后延续达五十年。这两个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而且离我们时代相距甚近，所以从各个不同角度加以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不久以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徐川一同志出版了一本《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是近年研究太平天国的新成果。现在我又十分高兴地看到张珊同志这本研究捻军的新成果。我对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关的文章都喜欢阅读，但没有研究，所以没有发言权。但对这个选题却是重视的。不仅对这两个农民起义重视，且对所有涉及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都有兴趣，也写过一点文章，出过几本小册子，但因用心不专，都比较粗浅。张珊同志毕其一生专门研究捻军问题，治学严谨，多有独到见解，我一直非常敬佩。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研究农民问题，因为如上所说，这不仅具有科学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1991.12.21)

前 言

在有清一代历史上,由于满洲贵族长期封建、落后、残酷、腐朽的统治,使得在中国这块有几千年文明史、有全世界几个最大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道教思想影响的广阔土地上,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既有受到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影响而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有不少回民起义,既有受到佛道思想影响而产生的白莲教起义,也有受到单纯儒家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大成教起义。花色品种最多的,还是各式各样数不清的会党起义。其中最复杂也是最大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究竟受何思想影响而产生,直到目前尚无统一看法,多数人认为是受基督教的影响而产生的。

捻军起义是我国历史上最复杂的农民起义,但也是最标准的农民起义。从时间来说,捻子、捻军先后长达五十多年。从规模说,它的地区涉及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山东、陕西、山西、河北八省;它的组成,捻子地跨五省,捻子集团多得无法统计,捻军也是地跨五省,旗主多得无法统计,又不少先后发生,发展不平衡,纵横加在一起,数目更多。从它的力量说,所有捻军集团及其所有部属加起来,最多时有一、二百万人;集中起来远出行动的,经常有几十万人;最后剩下来以精锐骑兵占绝对多数的骑步兵,也有七、八万人;其精悍能战的程度,也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所仅见的。加上它的同盟军,也很复杂众多,既有幅军,也有长枪会(非后来的会党),有联庄会,也有淄川军,又有几支白莲教军,白莲教军中又有邱莘教军、文贤教军、金楼教军、西炉教军。

由于花色品种繁多,使史学工作者也迷惑不解。这个被封建统治阶级不认真区别、笼而统之,似非而是地都称为“捻匪”的怪物,究竟是什么思想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什么性质的起义?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是在太平天国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还是在白莲教的思想影响或者其他什么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和它的同盟军是什么关系?和太平天国、白莲教是什么关系?这便是本书需要探索的问题。

说捻军起义是最标准的农民起义,是就捻军的主体说的。是指它是在长期封建腐朽统治下,是大面积产生的,是综合多种因素在内的起义。它与局部反抗租税、土地掠夺,反对暴政、局部短时期的天灾人祸、利用迷信宗教思想、贩卖私盐、和绿林啸聚、逐渐聚集起力量等类型的起义是不相同的,甚至区别是很大的。正因为它包含因素之多——比中国历史上一切的农民起义原因都复杂的多,反而使人不易理解。中国人习惯性的受已知的中国古代几个较大农民起义的影响,总喜欢用陈胜吴广起义、赤眉绿林起义、黄巾起义、五斗米教起义、瓦岗寨起义、黄巢起义、宋江方腊起义、王小波起义、张献忠李自成起义、白莲教红巾军等起义,来类比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农民起义。类比不得,便不易理解,既不多理解太平天国,更难理解捻军。因为这两次起义原因都比古代的每次起义更为复杂,绝非因一时、一地、一事或几个事件而引起。原因既多,事件也多,便难免见仁见智,失之偏颇;而最终困惑不解,不易正确认识它。

必须明确,捻军起义是我国众多农民起义中,最后一个农民起义,距离我们今天最近,几乎举手即得,材料容易收集。如果经过深入研究,依靠人民群众,拨开云雾,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去伪存真,解剖这个麻雀,彻底取得对捻军的比较正确的认识,这对于澄清历史、弄清历史真象,使后人也不费力气就

能认识这段历史,不致再陷迷雾之中,是大有作用的。本书作者就是这样不揣鄙陋,怀着这样目的,来解剖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农民起义,使它从互相矛盾的历史资料,从模糊史学中水落石出。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尚望史学界予以指正。

本书共包括捻军史方面论文十八篇,其中有附录论文两篇,是历史学硕士徐国利的学位论文。因为性质相近、同出一体,也一并刊出。本书出版蒙安徽大学科研基金部份赞助,特此致谢。

1991年7月7日张珊书于安徽大学历史系

目 录

重视农民问题研究(代序)	欧远方	(1)
前言		(1)
捻军概述		(1)
捻军产生的社会背景		(22)
捻的名称由来及其特点		(38)
捻军的组织		(49)
捻军的战术		(64)
和罗尔纲先生商榷捻军的战术问题		(78)
捻军侯士维王万全事件说明了什么		(97)
清军圪寨清乡政策和捻军失败的关系		(108)
从白莲教的历史发展和它的特点看捻 军和白莲教的关系		(122)
捻军和太平天国的关系		(166)
张乐行的革命精神永在 ——纪念捻军领袖张乐行就义一百周年		(194)
张乐行传		(204)
张乐行的重要支持者——龚得		(224)
捻军中第一员勇将——任柱		(227)
张宗禹下落调查记		(231)
附录		(247)
清代中叶皖北的自然政治经济和社会 ——捻军产生的更广泛的原因		(248)
捻军民歌六十五首		(293)
刘疙瘩起义		(314)

捻军概述

1853年春天,太平军进入安徽并占领南京以后,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曾先后爆发一个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就是出名的捻军起义。捻军起义的地区虽然很大,但它的中心却在安徽、河南两省。其中特别是安徽捻军,不仅力量最为强大,和清军作战的时间也最为长久——达到十六年,而且活动的地区也最为广阔,除去安徽以外,达到江苏、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七省,给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打击也最大,是捻军的主流。因此一般人在说到捻军时,主要都是指安徽捻军。

安徽捻军起义的主要地区,是皖北的涡阳全县和亳县、蒙城、濉溪、宿县、阜阳、颍上、霍丘、怀远、灵璧等县的边区,而以涡阳为中心,涡阳县城就是出名的捻军根据地雉河集。捻军盟主张乐行是涡阳西北十二里的张老家人,捻军的重要领袖如龚得、韩老万、刘饿狼(刘永敬)、刘狗(二老渊)、孙葵心、江台陵、张宗禹等也都是涡阳县人。在捻军起义以前,涡阳原为亳县、蒙城、宿州、阜阳四县的边区,北部与河南永城为邻;捻军起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便在这里设立了涡阳县。

一、捻军的产生

(1814年~1853年)

捻军起义于1853年,但在很久以前,在安徽、河南、江苏交界一带就已经有“捻子”在活动。捻子的名称最早见于书面

记载的是 1814 年(清嘉庆十九年),清御史陶澍的奏折说:“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1815 年到 1816 年(嘉庆二十年、二十一年)颍州知府在他所张贴的布告中,才正式谈到“捻匪”,其领袖称为“捻头”。有人认为捻子是白莲教的一部分;但据我们调查,捻子和白莲教毫无关系,“捻子”是一些集团的通称。在清政府反动统治下,由于这些地区是安徽、河南两省的边界,政治更为黑暗,兵差、衙役、恶霸、地主更加残酷地迫害与剥削人民。这里又是出名的黄泛区,雨水也经常成灾,因而人民也非常贫困。据调查,捻军起义前,在张老家的四十四户中,有 56% 以上的贫雇农被剥夺了土地,都无法生活,人民为了生活下去,便不得不依靠宗族的封建关系,结合成一个个的集团,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这一地区又是两种盐区(淮盐和芦盐)的交界,贩私盐非常盛行,上述集团中的一部分便参加了贩私盐活动,结果出现了许多强大的集团,都有一定的实力,甚至拥有武装。因为皖北地区的口语称一部分、一股、一支、为“一捻”,这些集团都是“你一捻”“我一捻”的,结果便自然形成了“捻子”的名称。

虽然捻子的名称已经出现,但这时参加的还只是少数人。随着清政府的更加腐败,1842 年和 1844 年,即鸦片战争以后数年,黄河又连续三年决口,黄水经过皖北漫流入淮(这时黄河没有北徙,还从江苏入海),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1851 年和 1852 年又遇到连年的久雨为灾,人民饿死的很多,有一首民歌说:“咸丰坐殿闰八月,大雨下够两个月,黄河两岸开口子,人死大半显不着。”

正当人民大批死亡的时候,恰巧太平军进入安徽,皖北各县人民便纷纷起来打地主,扒地主的粮食,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原先“捻子”的活动只是反清的暗流,现在由于大批农民的参加,经过了质的变化,便正式成为捻军起义。

二、捻军大联盟和捻军的组织纪律

(1854年~1855年7、8月)

捻军虽然在1853年已经起义,但根据书面材料结合调查情况看,这时捻军有两个特点:一、各部捻军还非常分散,各有趟主(领袖),各自独立,还没有进攻清军、夺取政权的行动。二、这时主要还是打击地主,扒地主的粮食,分地主的财物。正因为如此,清朝官吏才想用可耻的诱降办法,使捻军投降,用这一部分捻军去攻击另外的捻军。结果当然没有达到目的,主张招降的周天爵也愁病而死。

因为捻军一开始就从经济上、政治上打击地主,加上清政府反动宣传并积极组织地主武装和人民为敌,捻军和地主的矛盾日益紧张起来。

1854年3月,太平军第二次北伐援军经过皖北,张乐行率领他的部下和河南永城捻军苏天福随太平军进入永城,受到城内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却引起河南地主的仇恨。河南永城西南部有一条河流,名叫包河,苏天福便是包河南岸的苏平楼人,距离现在的亳县境只有四、五里,距涡阳北境也只有十三、四里。当太平军继续北进以后,河南东部各县的地主武装,便大举进攻包河南苏天福地区;并乘机侵入安徽,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大肆烧杀,奸淫抢掠。引起安徽人民的极大愤怒,便纷纷要求参加捻军。经过几次斗争以后,捻军声势更加壮大起来。

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杀害,使涡阳一带的人民觉悟起来了。亳县东刘集一带有一个传说:“有一个人出门去了,老牛会(地主武装)来了,把他家剩下的六口人都全部杀死。他一气,就拿了一把刀跟大捻子去杀老牛会,一口气杀了许多,刀都杀软了。”

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安徽捻军张乐行部便和河南捻军苏天福部联合起来了。苏姓是一个大族，在永城西南有一百多个村庄，同族中约一、二万人。这两支捻军的合作，给后来的捻军大联合造成了有利条件。

1855年7、8月之间，捻军各部实现了大联盟，共推张乐行为盟主，捻军起义运动进入了它的高级阶段。自此以后，捻军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反清目标，在组织方面也初步统一起来，并在自发的基础上，确定了捻军的内部组织形式。

捻军的最高领袖是盟主，并不是皇帝，盟主对于各部捻军也没有任免力量，各部捻军还是独立的，盟主也没有设立各种职官或封爵，只有个别办文书工作的称为先生，捻军中只有军事组织，即自发形成的各种颜色的总旗、大旗和小旗，是捻军组织的基本形式。

盟主之下是总旗，以黄、白、红、蓝、黑五色区分军队，设有五色总旗头，即黄旗由张乐行自兼，白旗龚得，红旗侯士维，蓝旗韩老万（韩狼子），黑旗苏天福。各旗都未规定人数，有多有少，后来最多的是蓝、白旗，最少的是红、黄旗。五色之外尚有八卦旗（杨兴泰）、花旗（雷雁）、绿旗等，但因人数不多，实际上算不上总旗。

总旗之下有大旗，是组成捻军的独立单位，也是基本单位，因为能独立活动，出发一次，称为一趟，所以这种旗头又称为“趟主”。有些资料上把它弄错了，搞成“堂主”，使人望文生义，更以为是秘密结社烧香拜弥勒佛的白莲教了。

大旗之下有小旗，也没有固定编制，由十余人至数百人不等。一般都是步、骑混合，大部是步兵，小部分是骑兵，后来骑兵愈来愈多（进入后期，骑兵便成为主要的了）。

捻军的成员也不是固定的，这次可以跟这旗，下次则可以跟另外一旗。各旗都不储备军粮，搞到粮食，按骑兵两份、步兵

一份的办法分开。也没有常备兵，除去后来到淮南作战与后期捻军以外，是兵农不分的，出发回来后，就各自回家。

由于捻军是饥饿农民的武装组织，涡阳一带农民几乎整村整族的参加，因此捻军中的成员都是依靠宗族、亲戚等关系结合起来的。旗头是大族，力量也大，如张乐行一族有十八个村子，好几千人，所以力量也大，反之则小。这种封建的宗族结合有很大的排外性，各族都以旗头为中心团结群众，加上涡阳一带又多聚族而居，结果自然形成了一个的独立地区，好像许多独立的小王国。这种宗族结合严重影响捻军在组织上的统一。据极不完全的调查，仅涡阳一县已调查出的旗头就有四十余人，还有许多没有调查的。

由于捻军的严重分散状态，当然很难制定完整的政策。但由于捻军是革命的农民起义，当然有它反对的一面与保护的一面，反对的是地主，保护的则是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捻军行军条例规定：“禁止抢掠，严缉奸淫，贫民衣粮，不准扒运。”

民歌也反映说：“咸丰二年半，兴了大刀齐头镰，穷了多少日子主（即地主），发了多少穷光蛋，穷人孩子穿棉袄，楼主孩子披袄片。”又说：“一牛一驴广种田，光蛋子子（穷光蛋）跟我玩，瓦屋楼台少我债，专向大户去要钱。”

所有这些，说明捻军是严禁奸淫，不准侵犯农民利益的。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依靠群众进行长期的抗清斗争。”

三、清军攻雒河集和捻军第一次进入三河尖

（1855年9月～1857年1月）

捻军自1855年7、8月之交出现了各部的大联盟，并推张乐行为盟主以后，曾经向豫、皖边区的城市发动多次的进攻。1855年11月，正当张乐行围攻亳州时，清军也开始进攻雒河集。张乐行连忙撤兵南救雒河集，但雒河集竟被清军攻陷，张

乐行的祖坟也被挖掉。

1856年夏,清军又第二次攻入雉河集,自亳州沿涡河而下,捻军节节败退,6月19日清军攻雉河集,一路放火烧毁房屋很多。捻军见雉河集无法防御,便改变了作战计划,以闪电般的速度突然向西南渡过沙河(颍河)进攻豫、皖边界的商业重镇三河尖,清军防御不及,7月17日捻军便攻下三河尖,直接威胁了河南东部各州县。河南大起恐慌,清军连忙撤回进攻雉河集的河南军队,防守固始、陈州一带。这样一来,皖北又空虚了,捻军见皖北有机可乘,便用帆船满载胜利品沿淮东下,至汪家集登岸后,又以急行军驰向蒙城。

8月17日起攻蒙城,三天三夜没有攻下,便向雉河集挺进。清雉河集守将西陵阿、崇安见捻军来势凶猛,望风逃走,捻军竟不费丝毫力量收复雉河集。

清军“剿捻”计划遭到失败,引起他们内部的互相攻击,推卸责任,吵作一团。

1856年8月底,清军又结集力量,再一次进攻雉河集。捻军想分兵进攻清军的后路,牵制清军,使龚得攻太和,张乐行等亲攻萧县、徐州,但两路都未成功,清军仍死攻雉河集不放,捻军只得撤出雉河集。

太平天国自杨、韦事变以后,安徽战场上出现了不利形势,这时李秀成镇守桐城,感到兵源不足,便通过李昭受的关系,联络捻军。捻军遂以“听封不听调”为条件,约定“投”入太平天国,共同进兵三河尖、正阳关一带,攻下霍丘作捻军的根据地,然后向河南一带进攻。

1857年1月,各部捻军便又向三河尖一带转移。

四、捻军和太平军第一次联合作战—— 三河尖、正阳关战役和刘饿狼被杀

(1857年2月~12月)

清军三次攻陷雉河集,说明捻军不可能单独抵抗清军,必须和太平天国合作,而1856年又有严重的旱灾,皖北各县自5月至10月没有下雨,“两淮人相食”。而三河尖、正阳关又是淮河岸上的商业重镇,对捻军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这次三河尖战役,几乎所有的安徽捻军都参加了,不但是太平军和捻军的一次重要联合作战,在捻军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的一次联合。

1857年2月,捻军转移到颍上县南照集、闰河集、三河尖一带,3月3日围霍丘。这时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也在桐城大破清军之后,连破舒城、六安。捻军便派出龚得、苏天福前往迎接太平军,两军遂会于霍丘、六安的交界线上。

会师以后,联军又攻下正阳、霍丘,取得了联合作战的巨大胜利。但这时湖北清军已进入湖北、安徽交界的宿松。陈玉成率兵往救,李秀成也因为太平天国内部发生问题,而前往安庆,结果三河尖、正阳关战场上便没有太平军的主力,清军的压力完全落到战斗力远不及太平军的捻军身上去了。

这时正是灾情严重的时候,粮食极为缺乏,而捻军人数众多,都依靠就地取粮,人数虽多,反而成为不利条件,不能坚守据点。

1857年4月,清军攻陷三河尖正北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柳沟。6月,捻军又因为受到清军封锁,严重缺乏粮食而失去三河尖西北重要的屏障方家集,三河尖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久也被清军攻陷。这时蓝旗捻军防守正阳关,清军便集中力量包围正阳关。8月霍丘失守,正阳关情况更加危急,